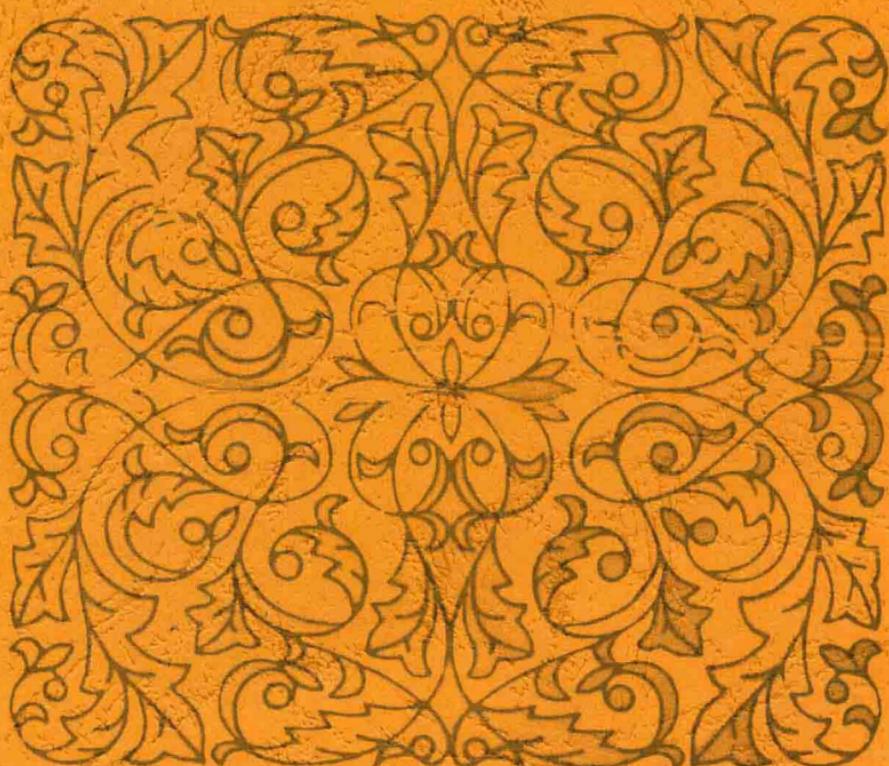


新編古今圖書集成

第四編

• 67 •



古史辨 第四册

羅根澤編著

民國叢書

第四編

上海書店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初版

甲 種洋宣紙洋裝實價
乙 種洋宣紙平裝實價
丙 種瑞典紙平裝實價

編著者 羅根澤

出版者 樸社

印刷者 北京書局

南池子飛龍橋十三號

總發行所 景山書社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

分售處 北平及各省各大書坊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古史辨

冊四第

羅根澤編著

古 史 辨

第四册

本書據模社1930年版影印

古聖賢傳

諸多贊嘆



吳華仕題

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優，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節財薄葬，閑服生焉。

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線。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

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忘歸，好色無辨，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撞之庭下，郊雉皆响，一朝用三千鐘，梁邱據子家喚導於左右，故晏子之諫生焉。

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脩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管別國也，地墩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

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顧序

字之廣，宙之久，材料是找不盡的，問題是提不完的。何況一種學問已有了二千餘年的積累，現在剛把傳統的態度澈底改變，開手作全盤的清理之時，其困難煩亂之狀豈是想像得出的。我編印了三冊古史辨，每每有人問我，『古史辨出齊了嗎？』我只得笑應之曰，『這書沒有出齊的日子，希望到我死後還有人繼續編下去呢。』因想起三年前在廣東時，有一位青年選修了我的課，耐不住了，焦躁地喊道：『我對於古史愈疑愈多，更碰更繁，越深入越不見底了！我看你找了無數材料，引了無數證據，預料定有斷然的結論在後頭，但末了仍是黑漆一團。如何你十年前的懷疑，到此刻仍未確定呢？我等待不及了！』他說的話是真心話，定然代表一部分人對我的感想。我慚愧我沒有法子使他們滿意，因為我的工作本來不是一服急效的藥劑，供應不了他們的需要。

秦漢間的方士常說海上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我們對於古史，正有同樣的感覺。在許多條件沒有比較完備的時候，要找得一個系統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條件是什麼？許多現存材料，應當依着現在的歷史觀念和分類法去整理一過，此其一。許多缺着的材料要考古學家多多發見，由他們的手裏給與我們去補綴，此其二。以前學者提出的問題，哪些是已解決的，哪些是待解決的，哪些是不能解決的，應當審查一下，結一清賬，此其三。現在應當提出的新問題是什麼？這些新問題應當怎樣去謀解決，應當計畫一下，此其

四。這舊材料和舊問題的整理已經够許多人的忙了，何況加以新材料和新問題的出現，更哪裏是少數人
的力量所能包辦的！

至少的限度，必須對於舊的有了過半數的認識，對於新的有了大體的預測，纔可勉強搭起一座架子來，稱之為假設的系統。這件事，現在能做嗎？數年以來，一般人不耐沒有系統，但也不耐費了大功夫去搜集材料和推敲問題，於是只在傳統的文獻裏兜圈子，真的不足，把偽的續，只要給渺茫的古人穿上了自己想像中的衣服，就自以為找到新系統了。唉，除了自欺欺人之外，世界上還哪裏有這樣容易的事情！我儘可以給他們同情心，因為『慰情聊勝於無』是人類的通性。但我的治學的責任心不許我這樣幹：它只願我一塊磚一塊瓦地造起屋子來，不願海市蜃樓在彈指之頃立現，也在彈指之頃消失。如果青年們因此而唾罵我為落伍者，那也只得聽之。

可是系統和結論，我雖不急急地尋求，究竟它們也常在我的心底盤旋，醞釀了好幾年了。今就作這序文的方便，略述所醞釀的如下：

我的研究古史的經歷甚簡單。幼年讀過幾部經書；那時適值思想解放的運動，使得我感到經書中有不少可疑的地方。其後又值整理國故的運動，使得我感到這方面儘有工作可做。因為年輕喜事，所以一部分的材料尚未整理完工，而議論已先發表。遭逢時會，我所發表的議論想不到竟激起了很多人的注意，盜取了超過實際的稱譽。在友朋的督促之下，編印了古史辨第一冊。我向來對於學問的嗜好是很廣漠

的，到這時，社會迫着我專向古史方面走去；我呢，因為已出了書，自己應當負起這個責任來，所以也把它看作我的畢生工作的對象。

自從發表了幾篇古史論文之後，人家以為我是專研古史的，就有幾個大學邀我去任『中國上古史』的課；我惟有遜謝。這不是客氣，只因擔任學校的功課必須具有系統的知識，而我僅作了些零碎的研究；圖樣未打，模型未製，就造起渠渠的夏屋來，豈不危險。若說不妨適用從前人的系統，那是違背了我的素志，更屬不可。可是受着生計的驅策，使我不得不向大學裏去討生活。民國十六年的秋天，我到廣州中山大學，到的時候已開課了，功課表上已排上了我的『中國上古史』了，而且學生的選課也選定了。這一急真把我急得非同小可：這事怎麼辦呢？沒有辦法，只得不編講義而專印材料，把許多零碎文字彙集一編，約略組成一個系統。那時所印的材料分作五種：

甲種——上古史的舊系統（以史記秦以前的本紀世家為代表。）

乙種——甲種的比較材料（一，史記本紀世家所根據的材料；二，其他真實的古史材料。現在看來，這兩類不應合在一起。）

丙種——（一）虛偽的古史材料；（二）古代的神話傳說與宗教活動的記載。

丁種——古史材料的評論。

戊種——預備建立上古史的新系統的研究文字。

那時搜集到的材料約有二百萬言，在一個學校的功課裡已不能算少，但自問把這些材料系統化的能力還差得遠；而且範圍太大，一個人也不能同時注意到許多方面。因此我覺得有分類編輯古史材料集的需要。但這是一個學術團體的事，或是一個人的長期工作，決不是教書辦事終日亂忙的我所能擔負的。

爲了北平的環境適宜於研究，所以十八年就回到這舊遊之地來，進了燕京大學。來的時候『中國上古史研究』的課目也早公佈了。幸而我有了兩年來的預備，不致像那時般發慌。但年前編的是些零碎材料，沒有貫穿的，現在則不該如此了。計畫的結果，擬就舊稿改爲較有系統的敘述，凡分三編：

甲編——舊系統的古史。

乙編——新舊史料的評論。

丙編——新系統的古史。

可是不幸得很，編了一年，甲編尚未編完，更說不到乙丙兩編。所以然者何？只因舊系統方面，我想編四個

考：（一）辨古代帝王的系統及年歷，事蹟，稱之爲帝繫考。

（二）辨三代的文物制度的由來與其異同，稱之爲王制考。

（三）辨帝王的心傳及聖賢的學派，稱之爲道統考。

（四）辨經書的構成及經學的演變，稱之爲經學考。

四種，我深信爲舊系統下的僞史的中心；倘能作好，我們所要破壞的僞史已再不能支持其壽命。我很想作成之後合爲古史考，與載客碎文字的古史辨相輔而行。可是一件事情，計畫容易，實做甚難。帝繫，道統兩考比較還簡單；而王制和經學的內涵則複雜萬狀，非隱居十載簡直無從下手。因此，在燕大所編的《上古史

講義只成了帝釋考的一部分，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新華學報六卷一期）即是這一部分中的一部分。

此後爲了預備作王制考，改開了尚書研究一課，一篇篇地教讀，借它作中心而去吸收別方面的材料。工作的情況，誠有如某君所云，『愈疑愈多，更確更繁，越深入越不見底。』不過，我不像他那樣急躁，決不以『黑漆一團』而灰心。我總希望以長時間的努力，得到一部分的『斷然的結論』來告無罪於讀者。

這一個計畫，蓄在我的心頭已三年多了。我自信這是力之所及，只要肯忍耐便有成就之望的。所以沒有發表之故，只因怕惹起了急性的讀者們的盼望和責備。現在強鄰逞暴，國土日蹙，我們正如釜中之魚，生死懸於人手，不知更能讀幾天書，再得研究幾個題目。就算苟全了性命，也不知道時勢逼着我跑到什麼地方，熱情逼着我改變了什麼職業。如果不幸而被犧牲了，那在民族與國家的大損失中也算不了一回事。但中國不亡，將來這方面的研究是一定有本國的同志起而繼續之的，我很願他參考我的計畫。所以現在略略寫出我對於這四種的意見：

我們的古史裏藏着許多偶像，而帝釋所代表的是種族的偶像。所謂華夏民族究竟從哪裡來，它和許多鄰境的小民族有無統屬的關係，此問題須待人類學家與考古學家的努力，非現有的材料所可討論。但我們從古書裏看，在周代時原是各個民族各有其始祖，而與他族不相統屬。如詩經中記載商人的祖先是一『天命玄鳥』降下來的，周人的祖先是姜嫄『履帝武』而得來的，都以爲自己的民族出於上帝。這固然不可信，但當時商、周兩族自己不以爲同出於一系，則是一個極清楚的事實。左傳上說：『任，宿，須句，顓臾，鳳

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則太皞與有濟是任宿諸國的祖先。又說，「陳顓頊之族也，」則顓頊是陳國的祖先。至於奉祀的神，各民族亦各有其特殊的。如左傳上說縣爲夏郊。又如史記封禪書上說秦靈公於吳陽作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這原是各說各的，不是一條綫上的人物。到了戰國時，許多小國併吞的結果，成了幾個極大的國；後來秦始皇又成了統一的事業。但各民族間的種族觀念是向來極深的，只有黃河下流的民族叫做華夏，其餘的都叫做蠻夷。疆域的統一雖可使用武力，而消弭民族間的惡感，使其能安居於一國之中，則武力便無所施其技。於是有幾個聰明人起來，把祖先和神靈的『橫的系統』改成了『縱的系統』，把甲國的祖算做了乙國的祖的父親，又把丙國的神算做了甲國的祖的父親。他們起來喊道，『咱們都是黃帝的子孫，分散得遠了，所以情誼疏了，風俗也不同了。如今又合爲一國，咱們應當化除畛域的成見！』這是謠話，卻很可以匡濟時艱，使各民族間發生了同氣連枝的信仰。本來楚國人的缺舌之音，中原人是不屑聽的，到這時知道楚國是禹的後人，而禹是黃帝的玄孫了。（國語中記史伯之言：越本芊身雕題，中原人是不屑看的，到這時知道越國是禹的後人，而禹是黃帝的玄孫了。）最顯著的，當時所謂華夏民族是商和周，而周祖后稷是帝嚳元妃之子，商祖契是帝嚳次妃之子，帝嚳則是黃帝的曾孫，可見華夏的商周和蠻夷的楚越本屬一家。借了這種帝王系統的說話來收拾人心，號召統一，確是一種極有力的政治作用。但這種說法傳到了後世，便成了歷史上不易消釋的『三皇五帝』的瘤癩，永遠做真史實的障礙。（如有人說：中國人重圓結還來不及，怎可使其分

散。照你所說，漢族本非一家，豈不是又成了分離之兆。我將答說：這不須過慮。不但楚、越、商、周已混合得分不開，

即五胡、遼、金諸族也無法在漢族裡分析出去了。要使中國人民團結，還是舉出過去的同化事實，積極移民邊陲，鼓勵其雜居

與合作。至於歷史上的真相，我們研究學問的，在現在科學昌明之世，決不該再替古人圓謊了。）除了種族的混合之

外，陰陽五行的信仰也是構成帝繫說的一個重大原因。

王制爲政治的偶像，亦始創於戰國而大行於漢。古代對於先朝文獻本不注意保存，執政者又因其不便於自己的行事，加以毀壞。所以孔子欲觀夏殷之禮，而杞宋已不足徵；北宮鍇問周室班爵祿事，而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但戰國的諸子同抱救世之心，對於時王之制常思斟酌損益；而儒家好言禮，所改造的制度尤多。又慮其說之創而不見信，則託爲古代所已有。淮南子修務訓所謂『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爲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直是說盡了這班造偽和信偽的人的心理。所以三年之喪廟之於堯典，五等之爵著之於春秋，而人遂無有疑者。同時出了一個鄒衍，他杜撰五德終始說，以爲『五德轉移，治各有宜』，政治制度應由五德而排成五種。他們說，黃帝爲土德，夏爲木德，商爲金德，周爲火德，秦爲水德，漢又爲土德；這各代的制度遂各不相同，惟漢與黃帝以同德而相同。稍後又出了一種三統說，截取了五德說的五分之三而亦循環之，於是政治制度又分爲三種。他們說，夏是黑統，商是白統，周是赤統，繼周者（春秋與漢）又爲黑統。有了這樣的編排，而古代制度不必到古廟去尋，也不必向古籍裏

找，只須畫一五德三統的表格，便自會循次地出現。例如禮記檀弓中說：「夏后氏尚黑，大事飲用昏，戎事乘驥（黑馬），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飲用日中，戎事乘驥（白馬），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飲用日出，戎事乘驥（赤馬），牲用辭。懂得了三統說的方式，就知道這一個禮制單是這樣地推出來的。如月令十二紀，則是五德說支配下的禮制。其中所謂五時，五方，五帝，五神，五祀，五蟲，五畜，五數，五音，五色，五味，五臭……莫不是從五行上推出來的。人事哪能這樣整齊，又哪能這樣單調！董仲舒所作的三代改制質文篇，寫的推求的方式尤為顯明。照他所說，自神農至春秋十代的禮制俱可一目了然；不但如此，推上推下可至無窮，真是「雖百世可知也！」照他所說，古代帝王儘不必有遺文留與後人，只要把他們的代次傳了下來，即可顯示其一切。以我們今日的理智來看他們的古史，不禁咋舌。但是都假了嗎？那也不然，他們總有一些兒的依傍。如上所舉，周人尚赤，牲用辭，乃由洛誥『文王辭牛一，武王辭牛一』及論語『犧牛之子辟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來。是則檀弓所言，別的均假，惟此不假。推想其他單子，亦當如此。即如明堂，月令中說得轟轟烈烈的當然是假，後儒把許多不相干的什麼文祖，太廟，衛室，總街……都說成明堂也當然是附會，但孟子裡的齊宣王欲毀明堂一事則不假。究竟三禮中有多少是真的，多少是假的，這是一件極難斷定的事情。[◎]這種的分析，將來必須有人費了大功夫去做。其術，應當從甲骨文中歸納出真商禮，從金文，詩書，春秋，左傳，國語中歸納出真周禮，史記，漢書中歸納出漢禮，而更以之與儒家及諸子所傳的禮書禮說相比較，庶幾可得有比較近真的結論。

這就是倫理的偶像。有了道統說，使得最有名的古人都成了一個模型裏製出來的人物而且成爲一個集團，彼此有互相維護的局勢。他們以爲『天不絕道亦不變』凡是聖人都得到這不變之道的全體。

聖與聖之間，或直接傳授，或久絕之餘，以天亶聰明而紹其傳。最早的道統說，似乎是論語的末篇，『堯曰：「吾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見得堯傳舜，舜傳禹，聖聖傳心，都在『執中』一言。下面記湯告天之詞，記武王大賚之事，見得湯與武王雖不能親接堯舜禹，而心事則同，足以繼其道統。但論語末數篇本有問題，此所謂『天之歷數』頗有五德轉移的意味，『允執其中』亦是儒家中庸之義，疑出後儒羼入，非論語本有。推測原始，當在孟子。盡心篇的末章說，堯舜後五百餘歲，湯聞而知之；湯後五百餘歲，文王聞而知之；文王後五百餘歲，孔子聞而知之。見得孔子的道即是堯舜的道，相去千五百餘年沒有變過。孔子以後，他以爲沒有聞道的了，所以以一歎結之。然孟子常說『私淑諸人』，乃所願則學孔子，可見他是聞孔子之道的，也就是直接堯舜之傳的。他說這番話，不過爲自己占地位。後人讀序到這一章，輒不自期地發生思古之幽情，有志遠紹聖緒。如司馬遷說，『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史記自序）這就可見孟子的話發生了有力的影響。其後揚雄、王通、韓愈等各欲負荷這道統，不幸沒有得到世人公認。到宋代理學興起，要想把自己一派直接孟子，以徒黨鼓吹之聲，竟得成功，而濂洛關閩諸家就成了儒教的正統，至今一個個牌位配享在孔廟。這個統，自堯舜至禹湯，至文武周公，至孔孟，又至周程們，把古代

與近代緊緊聯起。究竟堯舜的道是什麼？翻開經書和子書，面目各各不同，教我們如何去確定它？再說，孔孟之道是相同嗎？何以孔子稱美管晏而孟子羞道之；何以孔子崇霸業而孟子崇王道？即此可見孔孟之間相去雖僅百餘年，而社會背景已絕異，其道已不能不變，何況隔了數千百年。至於宋之周程門，其道何嘗得之於孔孟？周敦頤的學問受於陳搏，他是一個華山道士。太極圖是他們的哲學基礎，而這圖乃是從仙人魏伯陽的參同契裏脫化出來的。所以要是尋理學的前緣，這條線也不能挂在孔孟的脚下。他們又從僞大禹謨中取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算做堯舜以來聖人相傳的心法；但這是從荀子所引的道經加上堯曰雜湊起來的，道經是道家的東西，依然不是堯舜之言，儒家之語。至於堯舜以前，他們又要推上去，於是取材於易繫辭傳的觀象制器之章，而加上伏羲，神農，黃帝。只是這章文字非用互體說和卦變說不能解釋，而這兩種學說乃西漢的易家所創造，不是真的古代紀載。道統說的材料如此的一無可取，然而道統說的影響竟使後人感到古聖賢有一貫的思想，永遠不變的學說，密密地維護，高高地鎮壓，既不許疑，亦不敢疑，成爲各種革新的阻礙；這真是始作俑的孟子所想不到的成功。

—— 經學是學術的偶像。本來古代的智識爲貴族所獨占，智識分子只是貴族的寄生者。貴族有樂官，他們收聚了許多樂歌，所以有詩經。貴族有史官，他們紀載了許多事件，所以有尚書和春秋。貴族有卜官，他們管着許多卜筮的繇辭，所以有周易。貴族有禮官，他們保存許多禮節單，所以有儀禮。實在說來，幾部真的經書都是國君及卿大夫士們的日常應用的東西，意義簡單，有何神秘。詩，書，禮，樂是各國都有的。易和